

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学研究丛书

毛泽东思想 教学研究



海潮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教学研究

主编 王 前
副主编 陆水明
陈志勇
卜万平

海潮出版社
1999·北京

毛泽东思想教学研究

王 前 主编

*

海潮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三环中路 19 号 邮编: 100841)

南京政治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数: 313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 册

统一书号: 1 8 0 1 5 1 · 1

定价: 18.00 元

说 明

1999年6-7月，我们委托南京政治学院举办了全军院校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程教学研讨班。现将这次研讨班的部分研究成果汇编成册，印发各院校作教学参考。

总政治部宣传部

1999年10月

目 录

专题辅导

五四时期社会政治思潮更替与马克思主义主流

- | | | |
|--------------------|-----|-------|
| 地位的确立 | 陈志勇 | (1) |
| 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几个问题 | 卜万平 | (16) |
| 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 | 李佩良 | (30) |
|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与中国资产阶级 | 孔繁政 | (50) |
| 关于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几个问题 | 屈 明 | (72) |
|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 王 前 | (90) |
|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 李作民 | (110) |
| 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 | 陆水明 | (126) |
| 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丰富源泉 | 徐长安 | (143) |
| 关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 | 宗成康 | (161) |
| 国内毛泽东思想研究概述 | 李 墓 | (178) |
| 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评介 | 任伟民 | (197) |

经 验 体 会

从革命史向毛泽东思想概论课转换的几点思考 … 南东风 (219) 避免毛泽东思想概论课教学“革命史化”

- …… 袁付成 吕茂兵 谈国萍 左一夫 (224)

- 毛泽东思想概论教学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周春华 张永敏 (229)
- 理论与人格的双重魅力
- 对讲授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的几点思考 上官绪智 李春开 (234)
- “导论”教学之我见 张林龙 吴军 (239)
- 讲授毛泽东思想概论课应储备的理论知识 马向东 方晓涛 聂秀华 柳梅 (244)
- 上好毛泽东思想概论课需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王素梅 丁宗发 (249)
- 试论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的承上启下作用 江波 李锋 郑明志 (254)
- 讲好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确立的重大意义 李友安 肖瑶 刘海贞 (259)
- 紧紧抓住基本点不放 任世红 王江鹏 冯婧 (263)
- 毛泽东思想概论课教学应努力体现民族特色 游京录 孙辉 曹颖 王哲华 (268)
- 毛泽东思想概论课教学的几点哲学思考 郑瑞峰 单小娟 陈勇 张伟 (273)
- 把握“三个结合”，搞好毛泽东思想概论教学 冯谢明 蔡红焰 麻建科 李永玲 (278)
- 浅谈开设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的理论准备问题 易春秋 于昕 代华斌 (282)
- 改革开放前沿地区搞好毛泽东思想概论课教学的
几点思考 陈凌 万胜明 (287)
- 试论武警初级指挥院校毛泽东思想概论课教学的
针对性 马俊 胡宝学 张谊 (292)
- 着眼陆军初级指挥院校特点，搞好毛泽东思想概论

课教学	罗包庚 李会平 张广川	(293)
试谈毛泽东思想概论课教学的“新”、“精”、“实”	聂 莉 王睿丰 高文礼	(301)
如何激发学习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的兴趣和积极性	王绍军 李春开	(306)
克服三种心理障碍，搞好毛泽东思想概论课教学	张 弘 宗世杰 郭秋红 潘淑红	(311)
毛泽东思想概论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	梁永胜 游建明 胡 松 杨 波	(316)
试论毛泽东思想概论课对素质教育的积极作用	王 莹 刘 华 孙运德	(321)
对毛泽东思想概论教学处理好史论关系的一点认识	马建昌 王 辉 邹江明 罗 军	(325)
革新旧有方法 实现新的飞跃	——试论毛泽东思想概论教学法问题	
	单小娟 杨 濂	(328)
跳出“讲、记、背、考”的怪圈	苏向华	(333)
论多媒体在毛泽东思想概论课教学中的作用	周 林 张 涛	(338)
浅谈毛泽东思想概论教学的第二课堂活动	于 海 魏光磊 王殿强	(343)

论 文 选 登

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哲学基础	杨 濂 李泾一 段圣炼 李建伟	(348)
建党问题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中的意义	陆 浩 赵 哲 陈光辉	(354)

-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反侵略思想 周 林 (359)
- 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联系与区别
..... 张亚斌 张 洪 孙家荣 (364)
- 浅论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的内在联系
..... 程 玲 司鹏辉 谭晓靖 刘东莹 黄栋法 (370)
- 试论建国后毛泽东的军事威慑思想
..... 叶孟波 王 萍 郑跟马 王 鹏 马骏杰 (375)
- 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
..... 孙 慷 刘伶文 杨青芝 熊 星 (380)
- 科学认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
..... 孙宝元 王维军 宋 力 (386)

五四时期社会政治思潮更替与 马克思主义主流地位的确立

陈志勇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道路。鸦片战争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但是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马克思主义，因为缺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总的来讲，那时先进的中国人，还是向西方的资本主义学习，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自己的理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

一、五四时期新思潮的涌人

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一般是指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为止。它以五四爱国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民主与科学启蒙为主要特征，“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后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①这就是说，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既包括了五四前期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又包括了后期在启蒙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十月革命前，在初期新文化运动中，五四先驱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使中国出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人们继续寻找救国救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民的真理创造了条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自身获得新的觉醒，认识也发生了新的“飞跃”。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逐渐抛弃了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追求，逐渐由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化为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新文化运动也开始由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这种质的飞跃主要表现在：一是民主的内涵有一个从资产阶级民主到社会主义民主的演变；二是科学的内涵扩大为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社会问题；三是对帝国主义认识由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开始走上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道路；四是由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到争取民族的觉醒。由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换，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更替，这是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的巨大进步，反映了中国思想界的潮流在前进。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对整个社会思潮影响极大。五四后，思想界非常活跃，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进步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遍及全国。一年间成立的社团就有几十个，出版的新刊物竟达 400 多种。这些团体和刊物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再就是产生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最为突出的有李大钊、陈独秀等人。

早在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等人就开始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1918 年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的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三篇文章，这是中国人民开始认识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标志。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李大钊首先比较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他指出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试看将来的环球，必将是赤旗的世界！”陈独秀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他认为“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

义是“新陈代谢的公例”，“不可逃的命运。”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学术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他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就在这一年5月出了马克思主义专号，以后《新青年》就成为经常介绍马克思主义学术的重要刊物。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广大青年和进步团体中，迅速掀起一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并且和社会改造结合起来。这里特别要提到毛泽东，1917年他开始在湖南发起组织，至1918年4月成立了新民学会，从事新文化运动宣传。1918年他第一次到北京与李大钊等人接触开始倾向于马克思主义，1919年他回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开始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新民学会经常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提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指望，才有所趋赴。”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书社曾出版《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在通信中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问题。肯定了“中国应该走俄国革命的道路”；“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之良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中国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原理和方法”^① 并且提出要用列宁建党原则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此外，还有周恩来、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李达、高君宇、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向警予、罗亦农、彭湃、王烬美、杨匏安、阮啸仙、方志敏、袁玉冰等人也在各地进行广泛的革命活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并先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曾多年追随孙中山革命的老同盟会员朱德、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等，也在这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了新的革命斗争。正是众多多人的活动，才使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从而形成蓬勃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

① 《新民学会通信集》第2、3集。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同时，西方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纷纷传来。当时的所谓新文化、新思想，大体上有四种类型：一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人文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即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说；二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也打着自由民主的幌子传入中国，如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柏格森的创化论，杜威的实验主义，还有国家主义等等；三是形形色色冒牌的社会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四是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交替时期，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转折关头。随着经济、政治的大变动，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各种思潮是必然的现象。学说流派，五花八门，各色各样。主要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五四时期的所谓新思想、新文化，应该是指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文化，在开始是“民主”与“科学”，即所谓德、赛二先生；而在十月革命后，则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就当时思想界的实际情况来说，却要复杂得多。撇开封建复古思想不谈，也是各种思潮纷至沓来，错综复杂，在短短的几年里，几乎把西方经几百年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一股脑地搬到中国。在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中，只有一部分共产主义者认识到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中国命运的思想武器，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贩运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反动思想来抵制马克思主义；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是在当时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民族危机的冲击下，走出书斋，投身于革命运动。但由于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教育，他们心目中的新思想各不相同。这就出现了思想界一幅错综复杂的画面。二是兼容并包，模糊不清。在各种思潮中，社会主义最时髦，当时虽然形成谈论社会主义的热潮，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却没有一定的标准。人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时，并不注意它

的理论内涵的科学界定，并不介意各种流派的属性规定有何严格区别，笼而统之的对待，只要涉及到一点生产资料公有，财产平均分配等主张，往往都被囊括到社会主义名下。瞿秋白是这样描述的：“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①“隔着纱窗看晓雾”，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用这句话形容当时青年对社会主义的了解，那是非常贴切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各种社会主义开始也只能是左顾右盼，比较争辩，最终辨明了是非，分清了真假，确立了主流。

二、马克思主义主流地位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正是各种思潮在中国广泛流传中出现的，是在百家争鸣的复杂环境中进行的。开始人们也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各种思潮中的一个流派加以对待。不过，我们应看到，马克思主义毕竟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真理，必然会在我国近代思想运动中起主导作用。当然，马克思主义主流地位决不是轻而易举地实现的，也不是一帆风顺产生的，而是经历了从比较中鉴别，从实践中认识，从斗争中确立的发展过程：

第一，通过对各种主义和思潮的辨析、比较，逐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是热忱的民主主义战士，他们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念，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非屈服于任何压力，也不是追逐时髦。这是他们对于各种学说、各种救国方案进行了反复的比较和缜密的思考之后所作出的决定。如毛泽东，1911年以前，他接受过康梁维新派的改良主张，后来又信仰革命民主主义思想，1918年到北京，

^① 《瞿秋白文集》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3页。

在北大图书馆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小册子倾向共产主义，又“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1920年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他自己说：“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这才在茫注迷离的社会思潮中，彻底摆脱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此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① 又如陈独秀在论述我们“应讲何种社会主义”时，曾对社会主义的五种流派包括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等，进行过比较研究。

第二，通过社会实践，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革命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破天荒地在一个大国的胜利。这对中国来说，无疑不具有特殊吸引力。它极大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把目光转向社会主义，但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是五花八门的，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工读互助团、新村运动等曾在国内风行一时，但是好景不长，很快纷纷解体。就拿北京工读互助团来说，自1919年底正式成立，先后组织了4组。他们的理想社会是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他们主张用工读互助去改造社会。但结果不仅社会没有得到改造，工读互助团却纷纷解体。社会实践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一点一滴的改造，必须代之以社会整体的改造。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良方”。曾参加过工读互助的施存统得出的教训是“一、要改造社会需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或新村。”^② 这是亲身实践所获得的认识，很有说服力。不少人是在走了一段弯路后，作出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① 《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8页。

② 《星期评论·劳动纪念专号》第7张，1920年5月。

第三，通过思想论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帆风顺的，每前进一步，都要通过一番斗争。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引起反动势力的极端恐慌和仇视。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是“过激主义”，是“洪水猛兽”，“异端邪说”，并采取一切办法加以禁止、破坏和摧残。北洋政府曾连续下令查禁“过激主义”刊物，《每周评论》《湘江说论》都被查禁。1920年初，北洋政府通信查禁的刊物竟达83种之多，当然这也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流行。其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除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封锁和禁止外，还遭到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反对和攻击。胡适公开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声称中国不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不需要根本改造，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宣扬“一点一滴改良”，“一尺一寸进化”的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观点。梁启超、张东荪则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反对社会主义思想，硬说中国还没有无产阶级，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发展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才能为人们所信服和接受，才能成为新思潮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反动势力种种迫害的坚决反击，通过反对胡适改良主义，张东荪、梁启超假社会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同时，提高了人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第四，通过教育争取，引导青年走上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当时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和工读主义等思潮对中国青年的影响较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教育和斗争实践，使他们逐步摈弃了这些思潮，其中不少人走上了革命道路。就拿无政府主义来说，马克思主义者下了很大功夫争取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他们注意到，尽管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反动的，但是那些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大多是一些热情而又幼稚的青年，他们主要是认识问

题，必须把无政府学说和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区别开来。一方面，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另一方面，对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作教育转化工作，对他们既有批评，又有帮助。使他们提高认识，脱离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很多人先后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如何孟雄在李大钊的帮助下，陈延年、陈乔年在赵世炎、周恩来的帮助下，黄爱、庞人铨在毛泽东等帮助下，都经历了由无政府主义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任何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五四时期是我国思想大解放时期。这个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错综复杂。但是，百川汇海，在各种思潮的相互比较中，马克思主义得到了传播。中国人民正是在比较、鉴别中把信任票投向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三、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选择

所谓历史的选择，说到底是人的选择，但它又不是单纯的、不切实际的主观愿望，而是根据客观历史发展规律，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存在决定意识。虽然是人的选择，但主客观因素互为影响，互相交织，缺一不可。由众多的新思潮到马克思主义的一枝独秀，包含着那一代追求真理的先辈们在求索中付出的比较、尝试、论辨和思考，他们在比较、尝试、论辨和思考之后的选择正体现了历史的选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决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所谓感情冲动、选择失误，而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的必然结果。

五四前后，由于国内国际条件和知识分子认识的变化，人们开始摈弃资本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的变化是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怀疑和失望。

首先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辛亥革命不仅要推翻清王朝，而且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目的可以说达到了。但是，革命者流血牺牲、奋斗以求所建立的中华民国，到头来却成为军阀、官僚、政客手中的玩物和争权夺利的工具。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议会制度成为摆设，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人民没有丝毫的民主权力。孙中山尽管继续坚持不懈的斗争，但由于脱离群众，依然找不到出路，而陷入绝望的困境。所有这些，从不同的方面表明了旧民主主义的失败，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产，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民国建设的失败，给人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所以五四时，有很多人对辛亥革命后“共和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状况进行反思。李大钊说：“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瞿秋白也说：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权”的口头禅“在大多数的社会思想里，即使不生复古的反动思想，也就为人所厌恶。”^① 鲁迅更是不满，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② 中国社会现实的教训，使先进分子不能不产生失望和不满。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后“国家的状况一天一天的坏，环境迫使人们生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③

其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所显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与弊端，在中国思想界引起的对资本主义的怀疑和否定是空前的。这场野蛮的战争，使1千万人暴死沙场，2千万人受伤致残，社会生产和财富受到了严重破坏，亿万人民遭到空前的劫难。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被撕得粉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濒临灭顶之灾。危机观念，像一个庞

① 《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1页。

②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